

国家改革背景下的足球改革价值

张琪, 龚正伟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 上海 200438)

摘 要: 分析中国足球改革的价值理路以及足球改革对体育、教育和社会改革产生的影响。足球改革的核心价值包括促进人的现代化、足球运动组织化、传播工业文明主流观念。借助人和组织对价值观念的内化与实践, 改革成果将首先惠及体育改革, 然后影响教育活动的开展, 随后为社会改革提供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 进而实现改革的衍生价值。足球改革是国家转型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其改革成果和经验对接下来的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 体育社会学; 足球改革; 社会价值; 国家政策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6)05-0079-07

A study of football reform value in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reform

ZHANG Qi, GONG Zheng-wei

(School of Leisure Sports and Art, Shanghai Sport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438, China)

Abstract: By applying methods for studying history and logic unification as well as materialism,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value philosophy of Chinese football reform as well as the impact which football reform is about to produce on sport, education and social reform,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core value of football reform includes promoting human modernization and football systematization, and spreading the mainstream idea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nalization and practice carried out by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on values, reform achievements will first benefit sports reform, then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ctivities, later provide an ideolog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for social reform, and then realize the derived value of reform; football reform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its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are significant for com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 football reform; social value; national policy

2015年3月, 国务院公布《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下称《方案》), 标志着中国足球改革的列车正式驶入由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引领的改革和发展的快车道。《方案》主要针对基本要求、管理方式、运营模式、运动参与、发展保障5个基本方面对足球改革进行了说明。总体思路继续强化足球改革的政治性特征的同时, 着重强调了市场性、社会性在本次足球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基本要求中, 重申了以领导集体施行的社会改革总体布局作为足球改革的基本要求。管理方式方面, 对中国足协、俱乐部、国家联赛、场地设施作出了详细划分。运营模式方面, 对联赛、俱

乐部、职业联赛进行了相关约束。运动参与方面, 强调了校园足球、社会足球、梯队建设的重要性。而在资金投入、设施运营方面, 明确了引入社会和市场力量的保障手段。

价值哲学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关系”的基础之上。作为价值关系主体的人, 在特定的情境下产生的需求, 是一种特定价值关系的基础; 作为价值关系客体的对象, 其恒久的或暂时的质性特征是产生一种价值关系的必要条件; 当且仅当人的主观需求与对象的客观质性特征产生对应关系时, 这种特定的价值关系才建立起来。前苏联价值学派认为: 文化是人类创造性活动,

收稿日期: 2016-02-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国体育道德责任研究”(12&TYB001)。

作者简介: 张琪(1989-),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哲学。E-mail: 520180758@qq.com 通讯作者: 龚正伟教授

应把人这一主体作为理解文化的基础,人的创造性活动文化的价值标准有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历史进步价值,二是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梳理足球改革的价值既要遵循价值的生成规律,还要厘清足球改革价值的本质所在。足球改革价值是以足球领域的改革作为切入点,通过现代化改革继而惠及体育、教育和社会发展。改革纵有千万种,足球改革价值的本质是对足球运动的现代化和利用足球促进当前社会的现代化。改革只如无丸之火器,未曾有杀伤之效;足球则如器中弹丸,足球和改革结合才有具体作用;而改革的实践者就如持枪之士,其实践程度决定改革的影响力度和范围;改革的设计者就是指挥棒,决定了足球改革可能产生的积极、中立或消极的影响。

足球改革价值构建应遵从的逻辑进路:第一,根据足球改革的定位确定其对于国家、社会、群体、个人发展的意义(即足球改革是否有价值);第二,足球改革的积极影响哪些是由足球的本质规律所决定的(即足球改革的核心价值);第三,足球改革的积极影响哪些是由足球的次要规律决定的(即足球改革的衍生价值);第四,足球改革的过程中需要规避哪些潜在的消极影响。核心价值由足球运动的本质规律所决定,这使得核心价值既应当区别于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价值,又应该区别于其他运动项目的改革价值。因此,足球改革的核心价值就是通过对足球运动的改革所带来的具有独特性和排他性的对于个体、群体以及全社会的重要意义。这种重要的意义分别体现在身体观、道德观、组织科学化、社会思潮等方面。衍生价值是足球改革之后间接地对其他相关领域产生的积极影响。衍生价值并不由足球运动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也不由足球规律直接驱动。然而,由于当前足球改革影响和效果的扩大化,其衍生价值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

1 足球改革的核心价值

1.1 足球改革的个体价值

足球改革的个体价值是足球改革在个体层面表现出的重要意义,这种价值指向微观层面个体的人,具体表现为身体观、运动精神和规则意识方面的影响。首先,足球改革将重新实现对运动队身体存在的重视。工业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机器代替了人成为生产环节中的主要角色。健硕的身体在工业生产中变得无用,身体的自然能力遭到不断退化^[1]。此时,在英国出现的现代足球则弥补了身体存在的空虚,足球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得人在工作之余找到展现身体能力的场所^[2]。马克思曾言,现代体育的重要价值之一便是使人在嘈杂的机器生产中重新找到了身体的位置。现代体

育的出现及时制止了机器生产引起的日常生活身体性缺失的趋势^[3]。这也是我国足球改革为何要力求惠及全民的原因。足球改革的内容不仅局限于职业联赛和国家队的范围,而是希望通过高水平比赛的吸引力,带动群众足球、基层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参与足球、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身体性会自然地恢复到人的主体地位。身体主体性的回归不仅会对国民体质水平起到积极作用,还为中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保障。

其次,足球运动重视现代人的精神存在。现代足球所倡导的人之精神可以追溯到英国近代的绅士精神和骑士精神^[4]。1926年,美国运动员精神协会规定8条有关的行为规范:遵守规则、对同伴忠诚、身体健康、不乱发脾气、比赛中远离残忍、胜不骄败不馁、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利他主义的运动员精神认为,在比赛过程中不仅要求公平竞争和遵守规则,而且还要求参与者真正关心同场竞技者(包括队友和对手)的利益^[5]。足球运动倡导的精神是人作为社会存在所必需保有的信仰。利他和利己在交往过程中达到平衡,利己保证了自身利益不受他人侵犯,利他则表现为对他人的关心和照顾,这种平衡实现了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交往中的人,不仅要在运动场上发扬体育运动所倡导的精神内涵,还会把这些优秀的观念融入生活,使体育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6]。

再次,体育运动的规则协调了利己和利他之间的关系。体育规则是践行契约精神的产物,反映了契约关系中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的意识^[7]。卢梭在其著作中谈到,最初的契约关系就是人们为了某种共同的公共需求而自愿让渡出已经获得的利益,以求得团体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在与来自不同地域、文化、信仰和种族背景下的人们互惠交往时,一种能够确保双方交换自愿、平等的保障性手段就显得十分必要^[8]。1848年颁布的《剑桥规则》标志着足球运动进入现代化和标准化的发展阶段。运动员在场上的利益既受到规则的保护,同时对他人利益的侵害也会受到规则的惩罚。在规则的规治下,运动员不能无限制地获得自身利益。运动员必须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顾及其他人的利益,这就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体现出了很多的利他行为^[9]。由此,通过运动参与,借助规则的规治作用,利己和利他行为在运动场上达到了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进而延伸到社会交往之中,影响了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交往行为^[10]。

1.2 足球改革的组织价值

足球改革的组织价值是足球改革在组织层面表现

出的重要意义，这种价值指向中观层面群体的组织，在促进组织科学化的进程中具体表现为专业化和职业化方面的影响。首先，足球改革会掀起足球行业的专业化浪潮。足球场上的专业化趋势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于成绩的不断追求所造成的，比赛结果反映的是球队日常科学化训练的效果。球队之间对于成绩的追求迫使运动员试图摆脱经济因素的制约，进而投入更多的精力以达到提高并超越竞争对手运动水平的自我要求。足球场上球员位置和分工的出现使得运动员必须通过专门性训练获得更高的运动技能，足球运动的专业化和专门化发展走上了历史舞台。加登纳^[11]认为，“5世纪末，过分注重身体卓越和体育上的胜利造成了专业化和职业主义。”专业化趋势使得球队成员出现了分工和分化，教练员、经理人、队医等相继成为足球团体中的不同角色。为了持续不断地提高运动能力，训练内容也被相继分化成不同的种类，诸如技术练习、素质练习、战术练习发展成为独立的训练科目。甚至是根据球员特点、文化背景等因素演化出了诸如南美足球、欧洲足球、亚洲足球等不同的足球流派。专业化在足球事业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演变为职业化。足球是较早完成专业化发展的现代体育项目，随后出现的国家体育组织和国际体育协会进一步证明，专业化不仅是足球更是体育发展的显著趋势^[12]。

其次，在足球发展专业化的基础上促进足球产业的职业化。职业化和专业化相辅相成，其区别在于职业化是高度专业化的结果。职业化的浅层现象是依靠专业能力获得金钱和报酬，而其深层含义是通过专业能力的释放以获得更多专门性时间提高这种运动能力。因此，运动员取得何种水平的成绩并不取决于他在训练中获得了多少报酬，而是由投入训练的时间所决定的，报酬又称为维护时间投入的首要因素。这就要求职业者拥有一定水平的专业技能用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和再生产投入。回首我国足球发展史不难发现，专职教练、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纪人的出现都是从专业化向职业化发展的结果。尽管众多学者意识到了职业化可能对足球的自身发展带来危害，但是作为一项开展极为广泛的全球性体育运动，足球领域内的职业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自从第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领取了他2英镑的周薪，体育的职业化便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学者们的警惕值得注意，过度职业化带来的市场泡沫和发展扭曲，都是足球改革过程中需要严防死守的问题。

1.3 足球改革的社会价值

足球改革的社会价值是足球改革在社会层面表现出的重要意义，这种价值指向宏观层面的社会认知，

具体表现为调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其他思潮对于主流社会认知的影响。首先，立足当前国情对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选择性继承，这就既要保证本土文明延续的一致性，又要剔除其中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消极因素。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这种生产方式形成的社会思想是不利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例如新时期生产方式的改变、生产资料的归属、生活方式的改变都需要新的社会思想予以支撑。守旧、人治等不适宜现代社会运行的旧式思想将逐渐被新的文明所替代。但是农耕文明的田园性特征，在现代社会以明显方式在体育运动中保留下来。现代足球诞生之时，劳动场所从田间地头转换到厂房车间，劳动者习以为常的自然化劳动环境被彻底改变。为延续对于自然的渴望，劳动者在业余时间以足球运动代替了田间劳作。诚然，农业文明已经逐步脱离当前的主流文明，然而不可或缺的农业生产以及大量的农业人口决定农业文明仍然保有广阔的生存空间。随着农业生产向工业化的转向，农业文明于当代也必然会出现适应性的变革。

其次，吸收、转化西方工业文明的优势观念。现代体育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13]，它不仅帮助人类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还通过思想观念的传递促进了人类对于现代社会的建设。对于个体的影响而言，现代足球约束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行为。体育活动中体会到的身体性、遵守契约、运动员精神等信念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保证了自我的生存、对他人的关照、平等和自由的精神。对于社会整体而言，现代足球自身的发展就像社会的缩影，理性化、科层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趋势暗合工业社会的发展脉络。借助足球活动的广泛开展，一种符合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将首先在人们的意识中构建起来，进而实现人的大规模现代化改良。当人们进入社会交往情境，足球以及现代体育暗含的发展规律将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以此为径，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完整的教育、教化路径，并且通过施加影响来回馈现代社会的发展。

再次，通过强化主流价值观念消解亚文化和异化文化的侵扰。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表明国内区域间存在较大发展差异，除了个别较为发达的地区，国家整体上还未进入充分发展的工业社会阶段。但是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国外社会思潮的侵袭，保守主义、新儒家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过早的开始对于主流观念的批判^[14]。以至于许多决策还没有制定，就遭到了来自社会各方的强烈批评。诸如专家无用论、反对一切权威等观点就是典型的代表。作为强国过程中的足球改

革,应当借助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机遇,宣传和建立符合国家长期发展需要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现代足球背后所隐喻的身体性、契约精神、竞争与合作与运动员精神都是优秀的现代社会个人行为规范。在这个基础上,现代体育(以足球为切入点)逐步发生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与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相互匹配。当这种优秀的社会价值观念建立起来以后,文化的保守性作用就会将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其他文化元素拒绝在主流之外。

2 足球改革的衍生价值

2.1 足球改革对体育发展的影响

首先,体育组织的现代化转型。随着足球改革的成果惠及中国体育事业,体育组织的现代化转型即将大规模出现。其原因既包括国家政策指导的体育政府机构职能转型,由直接管理型向间接治理型的转换;还包含作为体育参与主体的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被广泛激活的外部动力。当政府退居为第三方的监管角色,那么对于体育组织的治理将形成内部自治和社会外部约束的局面。首先,作为体育组织内部的关系纽带,组织内成员之间的信任将会广泛形成。信任连结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信任使得自发体育组织成为可能,也为体育组织之间的相互交往提供了契机。基于信任的基础之上,契约代替身份成为个体和群体的身份标识,旧式的社会地位决定论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诚然,当前的举国体制仍然暗含着社会地位的因素,但是体育机关撤出具体事务的决心已经显现基于契约构建身份的作用。中超俱乐部的股权结构和投资人关系就是典型的代表。尽管省级体育局的行政审批仍然决定着俱乐部存在与否,但是随着体育市场化的改革,此类事务性审批必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转而以合同、法律的框架调整相关机构的利益关系。接下来,将有必要建立一套协调体育组织内外部利益关系的机制。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上海设立仲裁庭,以及该组织受理的关于足球运动员合同的仲裁案例,都在倒逼国内体育领域建立与国际体育仲裁对接的法律机构。

其次,体育行为将追寻体育的本质要求。由于建国以来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体育长期被赋予过多政治、经济、军事的附加价值。经过几十年的沉淀,这些附加价值正在逐渐从体育剥离开来,同时体育显现出被长期掩盖的本质追求——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人之存在而言,体育的根本追求就是提高人的自然能力,进而增强人在自然世界中的生存能力;对于人之发展而言,体育的最大追求莫过于促进个体的社会化以及个体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体育通过作

用于人,借助个体的体育行为表达出体育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推动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体育行为就成了个体和组织表达体育观念、追求体育本源价值的途径。市场经济转型引发了传统利益观的变革,当政府退居治理者的角色时,社会成员最为广泛和基础的个体需要将被释放。这种释放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历史性的体育价值没有直接关系,更为密切地是表达出社会个体对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刺激下,兴奋剂、内幕交易等行为也就失去了形成的动因。人们希冀于保全自我而乐意在交往中采取一种道德的行为;正是这种道德的行为又促进了整个体育环境的积极发展。经过循环,个体和群体在体育参与过程中表达出的体育行为将实现体育本质追求的回归。

再次,体育即将迎来理性化和科层化的集中发展期。沿着足球改革确立的现代组织观念,参与者开始以契约定位自我,这之后便迎来体育事业的崛起和发展。体育事业理性化的发展趋势要着力扭转旧式粗放型的管理体制。当前,我国职业足球培养体系的选材问题尤为突出。由于体制和政策优势,改革开放之前的青少年运动员选材拥有大量的挑选基数;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就业取向的丰富使得选材基数大幅变小。这种情况就迫使管理者必须在有限的培养对象中尽可能多地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曾经粗放的培养体系无法胜任,因此足球乃至体育的发展必将走上理性化的道路。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剑认为,中国足球的落后并非单项赛事成绩不尽如人意。足球国家队的战绩表达的是中国足球发展体系的水平。国内足球发展模式的落后注定了作为终端产品的竞技成绩的差强人意^[15]。想要重振国家队的雄风,则必须在培养、管理、运营等多个方面协同改革,只有形成现代化的中国足球体系,竞技水平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提升。现代化的足球体系则必须以理性和专业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理性化趋势是伴随着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协同作用出现的^[16]。专业化要求从业者的技能必须得到高度的发展,无论是运动员的运动技能、教练员的训练水平、还是职业经理人的商业手段,在契约确定其身份之后需要专业化来达成从业者自我与身份的契合。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契约身份的分化,进而形成了体育从业者职业化的发展趋势。诚然,不管是当前的足球还是体育事业,职业化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程度。即便是市场化改革较早的职业足球,其相关从业者也远未达到充分职业化的标准。这就为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的体育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度职业化以后的体育将会进入科层化阶段。科层化的体系容量限定了体育事业发展的量级以及能够容纳的体育从业者和服务对象的数量。以我国社会

体育指导员为例,由于当前群众体育发展的理性和科层化缺位,使得高校培养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无法与公共服务体系和市场机制接轨。这些问题都会随着体育改革的深入而得到缓解,同时由于吸纳更多的社会成员进而促进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2.2 足球改革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首先,体育的教育功能将会重新被发掘。狭义上的体育就是指学校体育。但是目前学校体育则明显处于学校教育的弱势地位,课时量不足、教师待遇低下、教学设施匮乏都是当前学校体育认识不足的有力佐证。校园足球的开展为弥补基层学校客观经费不足的状况提供了机遇。目前,首批计划在国内建立5000所足球特色学校,并且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尽管计划初期的投入对于建立成体系的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机制仍显单薄,但是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将使得校园足球受到重视,同时带动学校体育整体的共同进步^[17]。观念上的“拨乱反正”为正视体育的教育角色奠定思想基础。广义上的体育泛指社会环境中广泛开展的体育活动。体育活动带有鲜明的意识观念和文化内涵,以现代足球为例,其本身首先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次又蕴含着支配人类社会运行的行为准则。可以想象,借助足球改革广泛开展足球活动(特别是校园足球对学生的作用)能够有意识地向社会成员强化现代意识,形成全社会主流的话语体系和行为规范。研究认为足球改革对于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即带来先进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又作为具体方法实现狭义和广义的教育目标。所以说,体育的教育功能即将在当代被重新发掘和定义。

其次,教育将从知识习得转向文化传递。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延续前人成果所出现的一种专门性传承活动,传承的内容既包括物质、技术层面的外部知识,也有作为构成个体价值观、世界观的内部精神。以往的教育过于强调了对技术和物质基础的传递作用,而没有重视到教育对人之观念的作用,这也导致“外科手术”式的教育改革政策层出不穷。随着教育目的逐步转向通过教育活动促进人格的形成,体育作为统一了方法和素材的教育形式和内容,将要承担更大的教育责任。诚如前文所述,足球作为现代体育的代表项目,其自身就包含了多种层次的文化内容。文化既直接作用于教育,还通过文化折射影响教育活动,教育在实质上已经与文化形影不离^[18]。教育活动的內容映照着文化的核心要求,通过教育活动的开展则更加强了文化核心的坚固性。同时,足球作为一种参与性的体育活动,体验式的教学过程是其他教育手段所不能替代的。通过体育(足球)活动的

开展,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便接受了教育内容的影响。而且体验式教育能够在过程中重现日常生活场景,其教育效果比单纯地传授文化知识更加能约束日常行为,进而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在被教育者观念中得到强化。

再次,逐步融入以体育为手段的德育路径。上海市已经开始体育中的教育、德育一体化探索,经过初期调查显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表现出对于体育德育功能的青睐。德育工作的首要目标是传递价值观念,现代体育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恰好契合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借助国家“校园足球”的政策助力,足球运动所代表的价值体系将会伴随着体育活动的开展贯彻到受教育者的头脑中^[19]。体育活动,是当前学校教育中展现身体有用性的唯一途径。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意识到身体的存在和有用时,买卖器官、体质下降等棘手的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身体文化之后,现代体育被附加了诸多社会道德的伦理要素——倡导公平竞争、遵守契约精神、鼓励合作、追求自我修养等。马云在投资职业足球时表示,适逢改革期投资足球是对于足球运动的教育、教化功能的追随。足球运动是对青少年团队观念、合作精神、规则意识最好的培养,而这些基本素质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20]。然后,体育在实践过程中承担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21]。回溯历史,上海圣约翰书院于1890年举办我国最早的田径比赛;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于1895年将篮球运动传入中国;南洋公学和圣约翰书院于1896年举行了国内首场足球比赛;自此以后体育的作用便如浩瀚星尘功用之大世人共睹。无数成功案例已经表明体育作为德育手段的有效性,国家政策也引导了体育定位的迁移,因此接下来体育将会逐步融入德育工作体系并产生效用。想要行之有效地实现校园足球的德育功能,必须要建立在充分把握足球运动的规律之基础上。笔者在调查走访期间发现,部分学校因为场地设施限制只能以个人技术练习完成校园足球的教学。失去了团队化比赛和练习的校园足球,难以实现团队精神、规则观念、协同合作的德育目标。因此,对于校园足球德育功能的发掘,仍然需要建立在足球活动的基础规律之上,坚决不能沦为邯郸学步的形式主义工作。

2.3 足球改革对社会改革的影响

足球改革的成果会直接助力中国体育改革,通过影响与之关系密切的教育事业,而后促进人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最终促成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变革。《方案》勾勒中国足球的发展蓝图,作为十八大精神的贯彻落实,足球改革正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点。足球改革带来的思想变革会从以下方面影

响中国的社会发展。

首先,法治化将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职业足球市场化改革之后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协调蜂拥而至的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方案》认为:“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原则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会……”为了防止剥离权利与职责重叠之后,足球产业走向部门回避的另一个极端,《方案》决定“(足协)不设行政级别,其领导机构的组成应当体现广泛代表性和专业性,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地方及行业足球协会代表等。”此举避免了政府机关在市场运行中的利益纠葛,并且使政府退居旁观者的角色,通过制定法律和制度约束各方行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依法治国重大决定》)中要求:“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22]国家政策指导足球改革的方向,而足球改革则用具体的实践经验回馈国家法治化建设。法治化不仅要求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法律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法制体系首先要能够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其次要着重于现有规章制度的执行和落实、最后要实现对整个司法和执法体系的监督并促进立法的公平正义。诚然,数次的足球改革过程是成果与危机并存,改革背后的观念变迁是支撑改革继续深入的动力。足球反腐过程中,国务院组成的调查组打破了行业领域自治的传统,将社会公共领域的法律体系运用于曾经高度封闭的职业足球赛场。除了达到反腐的预期目标,同时也为治理其他自的行业提供了先例和操作经验。这就为建立统一、有序的国家法律体系扫清了观念障碍,也为国家法治进程打破了制度壁垒。足球改革经验说明:立法阶段要依靠政府的强制力实现,为保证执法效果就必须使执法者回避与其他参与者共同竞争的可能,由国务院牵头的足球反腐证明当行业内部腐败问题涉及国家利益时,行业自治的壁垒就不再是逃脱公共法律惩治的借口。

其次,市场在配置资源时的权重逐步提高。传统意义上认为,市场和政府是资源分配过程中两种拮抗的力量,强政府与强市场就像冰与火难以相容。中国特殊的发展历史决定了很长时间内,政府都处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绝对强势地位,而且发挥应有的作用。体育领域“举国体制”就是最好的例证:“长尾”原则的指引下,我国将大量资源投入国际竞争力层次较低,且一次投入多次回报的项目。然而后期由于运动员培养内容狭隘、成材率低、其他上行通道封闭、退役养老等问题,显示出高投入与高消耗之间的突出矛盾。

“搓澡工”等社会关注事件更是将体育战略中的“长尾”原则推向风口浪尖。随着社会容纳能力的提高和个人追求的多样化,市场在体育改革期扮演了重要角色,运用市场来配置有限的资源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发展趋势。《十八大报告》指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步入震荡调整与平稳过渡的“新常态”,惟有加快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走向可持续发展、结构性调整、包容性增长的转型升级道路。体育之外的其他领域还存在诸多类似的问题。承前所述,法治化必须作为先走在市场化的前面,市场化会充分释放人的个体需求以及加快社会运行速度。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全局发展不能一味地追求市场化,群众基础好的项目比较适宜且更容易得到市场的认可,但是一些参与门槛高、受众范围小的项目则难以迅速和完全的市场化。特别是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就简单地推向市场,可能造成的是项目自身的衰落。社会运行同样如此,进行市场化探索的同时仍然要坚守各个领域的基本规律。例如基础教育、基础医疗、民生等领域则不宜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发展过快,以至于撼动人民的基本生存资源。

再次,理性和科层化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理性和科层化正在助力体育改革,其实践效果已经带来诸多发展红利。借助这种趋势,体育自身会向着市场化、精细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改革同样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改革已然进入深水区,修修补补式的旧式改革已经难以满足长期利益对于当下政策的效益性需求^[23]。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思想,即新常态下对政府作用和职能的理性转变,对市场作用和地位的重新定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发展关系^[24],即“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市场已经显现出足够庞大的容量用以承载国内人民的生存所需。政府则需要将“零散的”人民汇集集中、有效的社会力量。例如,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过程中,政府希冀于通过技能培养造就大量的劳动人口,通过劳动技能的提高和完善形成相应的社会职业和晋升通道,并且伴随着职业体系的成熟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整个结构容纳大量的社会人员,既保障人民的就业问题,又为国家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保证。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发展体系的完善,理性和科层化的发展

趋势将影响到更广泛的行业和更多的人口。

足球改革将借助思想观念渗透的渠道影响个体、群体的意识和价值判断,进而通过促进人的现代化,最终影响体育改革、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实践成果。体育改革将会出现体育组织的现代化转型、体育行为的本质化追求、体育自身发展的理性化和科层化趋势。教育与体育的关系会更为密切:体育的教育功能将重新得到重视、教育将更加注重文化传递作用、体育的德育功能将被逐步实现。社会发展过程中,法治化将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市场在配置资源时的权重逐步提高、理性化和科层化会成为社会结构发展的主要趋势。足球改革拥有厚重的价值体系,如何落实种种改革价值,还应当着重关注改革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 [1] 让·雅克·库尔蒂纳. 身体的历史(卷3)[M]. 孙圣英,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11-143.
- [2] JAMES RIORDAN. European cultures in sport[M]. Bristol, UK: Intellect Books, 2003: 5-23.
- [3] ALLEN GUTTMAN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65.
- [4] ANDREW EDGAR. The aesthetics of the Olympic art competitions[J].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2012, 39: 185-199.
- [5] 于涛. 体育哲学研究[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9: 222-226.
- [6] 胡小明. 21世纪中国体育人文价值观念的确立[J]. 体育文化导刊, 2010(1): 134-137.
- [7] ANN E C. Sporting metaphors: competition and the ethos of capitalism[J].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2007, 34: 52-67.
- [8] 包利民. 当代社会契约论[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69-157.
- [9] CESAR R T. Competitive sport, evaluation systems, and just results[J].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2005, 32: 208-222.
- [10] RANDOLPH M F. Sportsmanship[J].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1986, 13: 1-13.
- [11] GARDINER E G. Athletic sports and festivals[M]. London: Macmillan, 1910: 4.
- [12] 卢元镇. 2008年后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准备[J]. 体育学刊, 2008, 15(2): 1-6.
- [13] 沃尔夫冈. 运动通史[M]. 丁娜,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18.
- [14] 衣俊卿. 文化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78-304.
- [15] 张剑. 中国足球的落后是整体体系的落后[EB/OL]. [2016-01-23]. <http://sports.qq.com/a/20160121/042743.htm>.
- [16] 胡小明. 中国体育的改革与创新[J]. 体育与科学, 2005, 26(5): 1-5.
- [17] 何强. 校园足球热的冷思考[J]. 体育学刊, 2015, 22(2): 5-10.
- [18] 宋志臣. 教育文化论[J]. 教育研究, 2012(10): 4-11.
- [19] 朱华. 文化强国与体育强国的关系探析[J]. 体育与科学, 2012, 33(5): 69-72.
- [20] 马云. 对改革足球很感兴趣进步要取决团队文化[EB/OL]. [2016-01-30]. <http://sports.sina.com.cn/china/other/2016-01-19/doc-ifxnqiz9858308.shtml>, 2016-01-19.
- [21] 卢元镇. 当今学校体育中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9, 25(5): 1-6.
- [22] 人民出版社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23] 人民出版社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24] 黄璐.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的国家战略思想[J]. 体育成人教育学报, 2015, 31(2): 34-37.